

曹植文学研究

邢培顺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曹植文学研究

邢培顺 著



中国社会科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曹植文学研究 / 邢培顺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 - 7 - 5161 - 4451 - 0

I. ①曹… II. ①邢… III. ①曹植(192 ~ 232)—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362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2
插 页 2
字 数 550 千字
定 价 77.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一

历史进入 20 世纪，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各种文化观念纷纷输入中国，使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变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呈现出新的面貌。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西方文化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史’的观念，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学’观念，我们有了文学史。”^①人们摆脱以往感悟式、诗话式的套路，运用历史学、文艺学、社会学等系统的方法，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此背景下，关于汉魏之际文坛巨擘曹植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成就。概括来说，研究成果的载体主要有几种形式：一是期刊论文，二是研究专著，三是博士及硕士学位论文。

（一）曹植作品的整理及研究

代表性著作如黄节先生《曹子建诗注》。黄节是民国时期研究汉魏六朝诗歌的名家，对建安诗歌的研究用力尤勤。《曹子建诗注》分古诗和乐府两部分，注释诗歌 71 篇，作者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自出新见，成为后人研究曹植的重要参考书。1956 年，余冠英先生《三曹诗选》问世，该书结合曹植生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对曹植的优秀诗歌进行注释，解析精审，论断惬当。1984 年，赵幼文先生《曹植集校注》问世，此书是曹植作品搜辑、校订、注释方面的重要作品，不计零篇单句，共收作品 230 余篇，在数量上超过前人。作品的编排，打破了体裁界限，以时间为顺序，分为建安、黄初、太和三个部

^① 朱自清：《诗言志辨序》，《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87 页。

2 曹植文学研究

分,这样,就可以让读者在阅读了作品以后,对曹植的文学创作在各个阶段的特色及前后期的变化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印象。

(二) 曹植生平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魏志·曹植传》对曹植生平事迹的记载相当粗略,这与曹植作为文学大家的地位很不相符,以致长期以来曹植的一些生平事迹仍不能明晰,一些作品的写作时代和写作背景仍不能弄清。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情况有了较大改观,出版了俞绍初先生《曹植年谱》,张可礼先生《三曹年谱》,尤其是《三曹年谱》,用比较丰富的史料,勾勒出三曹的生平事迹,让人们在了解三曹生平的同时,了解了建安时期的社会形势、文学发展面貌及三曹各自的思想状态和文学创作的前后变化情况。这时也出现了许多这方面的专题论文,徐公持先生的《曹植生平八考》是这类文章的代表作,文章对曹植生平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考证。俞绍初先生也对曹植生平事迹的考证作出了贡献,如其《曹植生平若干事迹考辨》《关于曹植初次就国的问题》等,材料确凿,论证严密。

(三) 曹植哲学思想、政治观念的研究

对曹植的哲学思想、政治理想研究比较系统、深入的是钟优民先生,其《曹植新探》用较大的篇幅,对曹植的自然观、人生观、生死观、政治理想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一些单篇论文也对曹植的思想观念进行探讨,如徐公持《略论曹植及其创作的特点》一文,该文认为曹植在思想倾向上的特点有三个:第一是广泛撷取先代各家思想;第二是在多元之中又以儒、道两家特别是儒家思想占据最重要的地位;第三是对一些问题颇有值得重视的见解,有的还具有唯物论色彩,但往往不够彻底,缺少系统性。关于曹植政治表现上的特点,徐先生认为,曹植对政治事业怀有始终一贯的热情,非常执着、自信,在政治上是有一定理想的,而且对一些具体的政治问题有颇为独到的见解,但是,他虽有对政治的热情,但缺乏观察、分析政治问题的头脑,缺少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手段,表现得疏阔少实干才能。^①

(四) 曹植文艺思想的研究

魏晋时期,中国文学发展进入了自觉时代,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等问题有了比较清晰和明确的认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曹丕和曹植是建安时期在文学批评上的代表人物。对曹丕在中

^① 《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一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61页。

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人们早已作了充分的探讨并给予较高的评价，而对曹植在文学批评思想上贡献的研究，则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即使如此，也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钟优民先生的《曹植新探》，设专节讨论曹植的文学观、创作论和批评论。在论文方面，裴登峰、张廷银先生的《略说曹植的文艺观》，小星的《曹植美学观初探》，陈飞之的《论曹植的诗学思想》等，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曹植的文艺思想和文学观念。特别是注意到了他对俗文学的贡献，如张亚新先生《曹植对民间文学理论的一点重要贡献》一文。值得注意的是，有论者为了强调曹植的贡献，证明曹植的成就不比曹丕差，还在一些问题上刻意附会，在具体的论证上存在“伛偻似恭”的现象。

（五）曹植文学创作成就的研究

曹植在诗歌、辞赋、散文的创作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对此，古今学者也大都给予较高的评价，故而在对曹植的研究中，有关成果较多。

1. 曹植诗歌创作的成就与特色。人们在说到曹植文学成就的时候，可以说主要就是指他的诗歌创作。早在 20 世纪初，黄节先生就在其《曹子建诗注·序》中说：“陈王本国风之变，发乐府之奇，驱屈宋之辞，析杨马之赋而为诗，六代以前莫大乎陈王矣。至其闵风俗之薄，哀民生之艰，树人伦之式，极情于神仙而义深于朋友，则又见乎辞之表者，虽百世可思也。”^①钟优民先生在《曹植新探》的“曹植的诗歌”一节中，分前后两部分论述了曹植诗歌创作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的特点。王钟陵先生的《中国中古诗史》、钱志熙先生的《魏晋诗歌艺术原论》都设专门章节论述曹植诗歌的特色及成就。各种中国文学史也都给曹植的诗歌留有一席之地。近年来不少论文从美学的角度探讨曹植诗歌创作的风貌，如吴怀东先生的《论曹植与中古诗创作范式的确立》、蔡振雄先生的《论曹植对诗歌文人化的贡献》等，都是有分量的论文。

2. 曹植辞赋创作特色与成就的研究。与对诗歌创作的研究相比，人们对曹植辞赋的研究，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相差很远。曹植辞赋的研究，更多地依附在各种文学史、赋史和建安文学的研究著作中，或是附着在建安辞赋研究的论文中，曹植辞赋研究的专著尚未见到，即使专门研究曹植辞赋的文章也很少。

^① 黄节：《曹子建诗注》，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3 页。

4 曹植文学研究

3. 曹植散文创作特色与成就的研究。对曹植散文创作的研究,目前来说还相当薄弱,这自然与古代文学研究中古典散文研究的不景气相适应,但这种情况尤其与曹植研究的现状不相协调,应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曹植的散文创作成就,虽在各种文学史及散文史中有所涉及,但大都浅尝辄止,未能进行深入研究。如徐公持先生的《魏晋文学史》只是略微谈了一下曹植的章表,然后得出结论说:“要之,曹植表文作品,在政治实用上甚为拙劣,在文学欣赏方面却价值极高。”专门论述建安散文的文章不多,而专门讨论曹植散文的著作和文章就更少了。周建国先生的《文章曹植波澜阔》将曹植的散文按体式分为颂、碑、赞、铭、章、表、令、文、七、咏、序、书、论、说、诔、哀辞十六类,认为“曹文体式众多,兼善各体”,展示了其鲜明的审美时代特征,表现为“风力高昂”“骈俪化”及“局法多变、率性抒写”等美学特征。

(六) 曹植文学继承的研究

在中国文学史上,曹植是一个承前启后、具有枢纽地位的作家,他广泛继承了以前的文化资源和文学创作传统,又为后人的文学创作创立了法则,故而钟嵘在《诗品》中说:“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但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仍不够全面深入,仅有少数的讨论文章,如虞德懋先生的《曹植诗歌艺术渊源粗探》、小星先生的《远绍旁搜自铸伟辞》、周建忠先生的《曹植对屈赋继承与创新的动态过程》及《陈思情采源于骚》、邹树德先生的《汉赋对曹植诗歌创作的影响》等。

(七) 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的研究

对曹植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古今学者和评论家大都给予充分的肯定,但如同文学史上的其他大作家一样,对曹植的评价也不是一致叫好,文学史上也有所谓抑植派,如王夫之、郭沫若先生等。20世纪50年代曾发生一场关于曹植评价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由郭沫若的《论曹植》引发。在该文中,郭沫若继承王夫之的观点并大加发挥,对曹植的人品、才能和文学成就基本持否定的态度。1955年,贾斯荣先生发表《关于〈论曹植〉》一文。该文反驳郭沫若的观点,并特别批评了郭沫若的“研究方法”。此后不久,张德钧先生发表《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廖仲安先生发表《关于曹植的几个问题》。这两篇又反驳贾斯荣的观点,为郭沫若辩护。这场争论虽然没有使曹植研究获得实质性的进展,但客观上使曹植研究问题更加引人注目。事隔二十余年后,徐公持先生发表《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重提这一几乎没有结论的论争,指出了郭沫若观点的偏颇,

对这场争论作了一个总结。曹植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古今学者大都是认同的，不过，随着历史文化语境的变化，他对后世文学影响的形式和幅度也发生了变化，对此，王玫先生在其《建安文学接受史论》中对这个变化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

（八）曹植与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

将曹植与其他作家进行比较，以考察其文学创作的特色及成就，进而凸显其在文学发展史上对前代作家的继承和对后世作家的影响，近⁴¹来，这一类的文章也比较多。对曹植的比较研究，有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横向比较，主要是将曹植与其父兄进行比较，如李南冈先生的《试谈三曹诗歌的审美特征》、沈念慈先生的《三曹乐府的音乐特色》、顾农先生的《曹丕曹植文艺思想比较观》、傅正义先生的《三曹诗义比较论》及《三曹诗歌艺术比较论》等。纵向的比较，有曹植与其前人的比较和与其后人的比较。与前人的比较，显示了曹植在人文精神和文学创作上的继承和创新，如小星的《曹植与屈原文学创作之比较》、汪大白的《曹植与屈原：历史性距离》等。将曹植与后代作家，主要是魏晋六朝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则显示了他对后世作家及文学创作的影响，在这方面，虞德懋的成绩比较突出，他连续撰写了《曹植与阮籍诗歌意蕴比较》《曹植与嵇康诗歌气格比较》《曹植与陶潜诗歌渊源比较》《曹植谢灵运诗歌薏脉比较》等一系列文章，通过曹植与这些魏晋南北朝大家的比较，揭示了历史文化语境对于作家的陶铸，汉魏六朝文化大潮的屈曲流变在作家身上所沉积的珠贝、所激起的泡沫及文化潜流的巨细迁变在作家身上留下的旋涡与浪花，具有历史、文化、美学的深度。

（九）对曹植与“古诗十九首”关系的研究

最近几年，木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于2009年出版了《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一书，论证“古诗十九首”产生于建安十六年以后，曹植是“古诗十九首”的主要作者，而且曹植的这些作品都与曹植与甄后的恋情有关。笔者认为，木斋关于“古诗十九首”产生时间的推测有一定道理，但认为其主要作者是曹植，且其创作背景是曹植与甄后的恋情，观点虽然惊世骇俗，似乎对陈年的悬案有了突破，并得到许多著名学者的吹捧，但他的论证完全不能证明自己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牵强附会，甚至是曲解作品的胡乱联系，缺乏作为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

二

关于曹植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但进一步的研究空间仍然很大。举其要者，有以下方面：

1. 对曹植生平考证仍然不够，这大大影响了人们对其作品的理解和研究。《三国志·魏志》曹植本传对曹植事迹的记载极为简略，而其他地方的有关记载也很少，这就使曹植的生平事迹很不明晰，影响了对曹植本人及其作品的认识和评价。虽然徐公持、俞绍初等先生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但近年来这方面的文章很少，研究显得远远不够。

2. 与第一点相联系，曹植作品的整理工作做得远不能令人满意，这影响了对曹植作品的研究和接受。如有些作品创作于何时，在何种情景下写成，都没能搞清楚，这就很难说对作品有准确的理解和恰当的评价了。在曹植的作品中，这样的情况不少，如《泰山梁甫行》写于何时何地，在何种背景下创作，迄无定论。再如《朔风诗》，写于何时何地，表达了怎样的思想和情感，其主旨如何，都没能搞清楚。这方面的工作，前人虽然做了一些，但还称不上详尽精审，且成果数量较少，不能适应曹植研究的需要。

3. 曹植的学术渊源问题。曹植博览典籍，学识渊博，但他对古代典籍的摄取，有他自己的特点和注意方向。在曹植研究中，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特别是他与荆州学的关系、与《诗经》，特别是《韩诗》的关系，尚无人作专门的探讨。

4. 曹植的文学师承问题。曹植的文学师承对象十分广泛，如对《诗经》《楚辞》、汉乐府、古诗、汉赋的继承，人们已有所论述，但曹植文学创作最近、最直接的取法对象曹操、王粲却很少有人提到，特别是曹植与王粲的师承关系，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

5. 曹植一生经历了建安、黄初、太和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曹植的生活处境有较大差异，因而文学创作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面貌。对曹植在这三个时期中的文学创作，其内容和形式上的特点，虽有人论及，但远不够深入全面。

6. 对曹植辞赋的全面深入研究还远远没有做到。曹植的创作是从辞赋开始的，辞赋也是曹植喜爱并终生创作不怠的文章体裁，可惜由于文集的大量散佚，现存曹植的辞赋多为残篇，这为人们的研究增加了困难。

7. 对曹植诗歌的综合研究。如对不同体裁和题材诗歌的特色及其在诗歌发展史上地位的研究等。虽然诗歌是曹植研究中用力最多的,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而仍有继续研究的较大空间。

8. 曹植散文的研究。在曹植作品的研究中,这是最薄弱的环节,有些体裁的文章,还根本没有人讨论过,就更谈不上对曹植散文的全面系统研究了,所以,这方面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三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当初在拟订选题的时候,我向导师王琳先生谈了自己的想法,先生认为,曹植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流的作家,在文学创作上既师承广泛,对后世又影响深远,其文学创作的互文性很强,在文学史上居于枢纽地位;他文备众体,而又诸体兼擅,是中国美文的创立者。研究曹植,既可以前后勾连,熟悉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脉络,又可以通过研究他的作品,弄清当时各种文体的体制特点及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情况。这对博士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可以为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而且目前对曹植文学创作进行综合研究的成果不多,先生希望我能做这个工作。

我不揣浅薄,接受了先生的建议,然在此后的论文写作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这个课题的困难。这是因为史籍记载的曹植的事迹及相关资料很简略,后世由于战乱等原因,曹植的文集散佚情况严重。今所存的文集是宋人依据史籍、类书和选本等重新编辑的,不少是残篇,许多作品的创作年代、写作背景及其目的都不明确。此外,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热点之一,曹植作为“建安之杰”,更是受到包括不少大家在内的学者的关注,故而要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开拓,确实有很大的难度。我一度想放弃本课题,但王琳师一再鼓励我、指导我,我终于把这个课题做了下来,虽然未必达到了预想的目的,但我自觉颇有收获,所以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恩师王琳先生。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曹植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	(1)
第一节 多元的政治中心	(1)
第二节 多元化的学术	(7)
第三节 文人出路的多元化	(11)
第二章 争嫡问题的再探讨	(16)
第一节 曹操的犹豫与抉择	(16)
第二节 曹丕的性格和行为	(22)
第三节 曹植的才气与退让	(29)
第四节 曹植黄初年间两次获罪事由探隐	(45)
第三章 曹植的学术渊源	(53)
第一节 通观博览 学无所遗	(53)
第二节 曹植与荆州学	(58)
第三节 曹植与《韩诗》	(63)
第四章 曹植的文学继承	(72)
第一节 对《诗经》的文学继承	(73)
第二节 对《楚辞》的文学继承	(77)
第三节 对汉赋的文学接受	(84)
第四节 对乐府的接受	(87)
第五节 对古诗的继承	(92)

2 曹植文学研究

第五章 建安文学的流变与曹植的地位	(106)
第一节 建安文学的分期	(106)
第二节 建安文学的先驱:张衡与蔡邕	(108)
第三节 建安文学前期的承中之变	(114)
第四节 八音合奏 谱成邺下乐章	(127)
第五节 集建安之大成,启正始之先声	(136)
第六章 曹植创作的阶段性	(141)
第一节 建安阶段	(141)
第二节 黄初阶段	(150)
第三节 太和阶段	(154)
第七章 曹植辞赋论	(164)
第一节 “少而好赋”	(164)
第二节 题材多样,内容丰富	(170)
第三节 体式多样,技巧高超	(177)
第四节 情志慷慨,雅俗共赏	(181)
第八章 曹植诗歌论	(187)
第一节 博取深思 蚌病成珠	(187)
第二节 成就卓越的乐府	(192)
第三节 体被文质的五言诗	(200)
第四节 典雅温润的四言诗	(208)
第五节 曹植诗歌的题材分类研究	(219)
第九章 曹植散文论	(267)
第一节 辞清而志显的章表	(267)
第二节 文约义雅的颂赞	(284)
第三节 内容丰富深刻 形式多姿多彩的序	(301)
第四节 意气俊爽的书信 通达圆融的论说	(310)
第五节 文润义雅的铭 辞清情哀的诔	(326)
第六节 辞华情至的哀辞及其他	(335)
第十章 曹植文学创作的俗化倾向	(341)

第一节 礼教松弛,个性张扬	(341)
第二节 建安作家重视俗文学创作	(347)
第三节 曹植文学创作的俗化倾向	(349)
第十一章 曹植与建安风骨	(355)
第一节 建安风骨的形成	(355)
第二节 曹植的文学创作与建安风骨	(366)
第十二章 曹植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影响	(374)
第一节 由建安文学殿军到“文章之圣”	(374)
第二节 在文体方面的影响	(379)
第三节 在创作技巧方面的影响	(383)
第四节 具体作品在魏晋南北朝的反响	(386)
结语	(390)
附论	(392)
一 王夫之评价曹植的得与失	
——兼及王夫之的“扬丕抑植”问题	(392)
二 秦嘉五言《赠妇诗》真实性不容否定	
——关于木斋先生“秦嘉五言诗为伪作”问题的商榷 ...	(417)
三 论清商乐与五言诗的成熟	
——与木斋先生商榷	(429)
四 曹植与《古诗十九首》	
——与木斋先生商榷	(441)
参考文献	(494)

第一章 曹植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

人们在讨论曹植生平思想及文学创作特色的时候，往往强调当时动乱的社会环境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对他的影响。在影响曹植思想和创作的诸多因素中，这一点无疑是重要的，但是，促成曹植独特思想性格和文学创作特色的因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而绝非单纯的一两个因素。而且，表面上看去与后世相似的一种现象，在汉末建安时代就可能具有特殊的意义。关于曹植生活的社会背景，人们多有论述，笔者希望避开那些烂熟的话题，只强调人们基本没有论述过或者尚未论述透彻的内容。

第一节 多元的政治中心

一 多元政治中心局面的形成

汉末建安时期，随着汉王朝的衰微，整个社会走向政治中心多元化。先是汉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在董卓之乱中变得有名无实：军阀割据，牧守自保，此时谋略之士依附于军阀，文学之士避难于牧守。建安九年，曹操攻占邳城，并以之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建安十八年，曹操为魏公：“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庙。……九月，作金虎台，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冬十月，分魏郡为东西部，置都尉。十一月，初置尚书、侍中、六卿。”北方形成了曹魏政权与汉政权并立的局面，南方的吴、蜀政权也逐渐形成，文人学士再一次面临去就的抉择。黄初以后，汉朝消亡，三国鼎立，中国历史进入虽政治分裂却又相对稳定的时期，文人学士的社会角色得以确定。

二 多元政治中心局面对建安文坛的影响

“建安七子”及曹植等人都是热衷政治，渴望建功立业以扬名后世

2 曹植文学研究

的人，这种政治形势和政治格局，必然会对他们的思想和心灵产生深刻的影响，进而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特别是曹植，作为曹魏皇室的重要成员，作为一个渴望立功扬名的有志之士，其在建安时期的立功对象与黄初以后的立功对象显然有所不同，因而，同是“立功”，其含义却大不相同。对这一点，曹植自己未必有明确的意识，但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却有比较明确的反映。关于政治中心多元化对建安文人在思想心灵和文学创作上的冲击和影响，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士大夫对汉政权的态度

汉末建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这是一个需要英雄而又产生英雄的时代。这个时期，文臣武将、英雄豪杰纷纷走上历史舞台，呈现他们精彩的表演。后世由于《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这些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生动地活在人们的心中，不过由于历史观念之网的过滤，文臣武将们的生命律动被贴上了道德的标签，英雄豪杰们的生动面庞被涂上了红白的脸谱。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建安文人王粲的《汉末英雄记》，就会发现当时人的观念与后世是多么不同。

原始儒家思想有许多精义，其中之一就是由虚构的尧、舜、禹禅让历史所显示的以“敬天保民”为最终旨归的贤人政治。这种观点认为，天下乃公器，唯有德者可以居之，谁最大限度地给百姓带来了福祉，谁就获得了天命。这种政治观念，在西汉时期的儒生那里，仍然相当明确，甚至强烈。如汉昭帝时的眭孟，看到汉武帝晚年的衰政，便上书要求汉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宣帝时候的盖宽饶，见汉宣帝崇尚刑法，信任中书宦官，便上书批评朝政：“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又引《韩诗外传》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①这种观念终于导致了西汉末期声势浩大的托古改制运动。光武帝建立东汉后，鉴于西汉大臣专窃政权的教训，在政治上，剥夺三公之权而专任尚书；在思想上，加强对群臣百姓的奴化教育，大力强调臣下对君上的单方面义务。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在政治上，三公形同虚设，致使封建社会的两大毒瘤——外戚和宦官势力得以滋长；在思想上，人们看重臣下对君上的义务，不再以对等的态度看待君臣关系。故而在东汉的中晚期，政治是那样的黑暗混乱，朝廷对正直士人的迫害是那样的严重，却很少有人怀疑刘氏拥有天下的合理性，从

^① 班固：《汉书》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47页。

而提出改朝换代的要求，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

但是，历史的发展有其规律，从来就注重历史经验教训的士人仍然有其衡量是非得失的标准，因而当东汉政权混乱至极的时候，他们也明确地意识到刘氏天下时运不久，改朝换代已为时不远。如东汉大名士郭泰，有人劝他出仕，他说：“吾夜观天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①这种预言固然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但它所显示的境界，与眭孟、盖宽饶的话所显示的境界，相去何其远矣。无论如何，郭泰的话不是孤议独见，此后历史形势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先是声势浩大的黄巾农民大起义，导致汉政权统治基础的崩溃；进而是既得利益者——官僚士人的离心离德。《后汉书·皇甫嵩朱雋列传》载：“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乱，海内虚困。故信都令汉阳阎忠干说嵩曰：‘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不旋踵者，几也。故圣人顺势以动，智者因几以发。今将军遭难得之运，蹈易骇之机，而践运不抚，临机不发，将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谓也？’忠曰：‘天道无亲，百姓与能。今将军受钺于暮春，收功于末冬。兵动若神，谋不再计，摧强易于折枯，消坚甚于汤雪。旬月之间，神兵电扫，封尸刻石，南向以报，威德震本朝，风声驰海外，虽汤武之举，未有高将军者也。今身建不赏之功，体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②这种想法和言论，必有一定的代表性，只是身为朝廷大员的皇甫嵩不敢贸然行事。但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人们就不再局限于想和说，而要付诸行动了。且看世传经术、四世三公的袁氏的表现。《魏志·武帝纪》注引《献帝起居注》曰：“公上言：‘大将军鄆侯袁绍前与冀州牧韩馥立故大司马刘虞，刻作金玺，遣故任长毕瑜诣虞，为说命录之数。又绍与臣书云：可都鄆城，当有所立。擅铸金银印，孝廉计吏，皆往诣绍。从弟济阴太守叙与绍书云：今海内丧败，天意实在我家，神应有征，当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则北兄长，以位则北兄尊。便欲送玺，会曹操断道。’绍宗族累世受国重恩，而凶逆无道，乃至于此。”^③袁氏世守儒学，又深受国恩，尚且如此，其他人想必可以推知。这正如曹丕所说：“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④由此看来，刘汉王朝已经没有了

① 范曄：《后汉书》卷六十八，第2225页。

② 范曄：《后汉书》卷七十一，第2302—2303页。

③ 陈寿：《三国志》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页。

④ 严可均：《全三国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9页。

4 曹植文学研究

存在下去的必要性甚至可能性了。

（二）时人对曹魏政权的态度

曹操出身于当时人们深恶痛绝的宦官家庭，既缺少可以凭借的政治资本，也没有当时士人入仕所必不可少的良好名品，这一点曹操自己也很清楚，所以他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弥补这些不足。在政治上，他搏击豪强和宦官；在思想观念上，他尽量向当时士人集团靠拢，并想方设法求得名人的品评。不过，在当时社会动乱、群雄纷争的形势下，曹操主要是凭借自己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才脱颖而出的，他对于汉王朝的再造之功，无论古今，是无人能够否定的。问题的关键是，曹操对汉王朝持怎样的态度？他又采取了怎样的政治措施？其实，从官渡之战以后，曹操就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北方政权，为自己的政治生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时，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臣武将，更重要的是，他取得了汝南、颍川、陈留拥有雄厚财力和智力的大族的支持，最典型的就是颍川荀氏。可以设想，他也取得了人心思定的北方百姓的拥护。曹操如果此时废掉汉帝而自立，很可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曹操的明智之举，是他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因。事实并不一定如此。奉人为主而又不甘心为之下，这往往容易给人以口实。在此情形下，曹操以汉朝名义来征讨割据势力，他的对手也同样可以以汉朝名义来号召百姓，对抗曹操。如当曹操率军南下，准备一统江南的时候，周瑜就以“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相号召。退一步说，假定曹操奉顺臣节，事事依汉献帝的意旨办事，别说汉王朝不能起死回生，就是能够延续下来，孙权和刘备就会甘心归降吗？怕也未必。这是从对外一方面说的。若从曹操政权内部来说，恐怕问题更加明显。建安九年，曹操占据邺城，并以之为根据地。至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说，曹操的势力已完全形成。可以说，在北方，曹操受到上至大臣，下至百姓的普遍拥戴。然而此时有一个问题却更加明显了，那就是文臣武将们为汉为曹的问题。有的明确，有的徘徊，有的疑惑，这本身就是一种内部力量的抵消，大大减弱了办事的效率。建安十八年，曹操被册封为魏公，九锡备物。此事出于谁的意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事受到了当时各类人士的赞成和拥护，这从大臣们的劝进表便可知晓。有前此的王莽做例子，此举的含义谁都明白，故而，群臣的劝进，实际上表达了一种意向，那就是希望曹操废汉自立，这于国家于个人都有好处。

实际上，这种愿望不单表现在这种场合，在日常的生活中，大臣们大概也时常流露出这种意思，因为这种政治格局，不仅让他们很不自